

移民岁月 第十期
YI MIN SUI YUE

各种形式来支宁

刘天明

复转军人

解放战争结束,大批的军人转业到地方,有许多回到家乡,没有产生移民情况。但也有大批的军队干部、战士并没有回乡,而是随部队在接管地被转业安排,实现了移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并接管了宁夏政权,所以宁夏解放之初,大批来自全国其他省区的十九兵团干部转业到宁夏,成为最早转业到宁夏的复转军人。和平建设时期,军队基本实行士兵复员回乡的政策,而军队干部则纳入国家计划,由政府实行统一分配。这就出现大批外地干部在驻地就地转业安排的情况。除文革期间外,宁夏政府每年都安排大批军队转业干部到各地方和各部。

1990年,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以国转办字[1990]6号文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照顾接收服役时间长、职务较高、贡献较大的转业干部作出规定,宁夏据此制定了有关的接受安置原则:1.原籍宁夏或从宁夏入伍;2.配偶系宁夏籍或自幼在宁夏成长,现在宁夏工作;3.服役期间,父母迁移宁夏;4.夫妇均系外省籍,其中一方在宁工作两年以上(含在驻宁部队服役);5.夫妇双方同时转业,其中一方是宁夏籍,从宁夏入伍或在驻宁部队服役20年;6.宁夏急需的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此原则下,1990年以来,军转干部主要是充实加强政法、金融、经济、监督、执法监管等部门以及其他有增加干部任务的单位。

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5年恢复军队干部转业安置工作,至1999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9692名。外省区军队转业干部在宁夏的安排,还涉及到随调、随迁家属及子女的安排。一般来说,一位军队转业干部的易地安置,意味着配偶、子女同时易地安置,平均迁移三四人。所以,宁夏解放以来易地安置军转干部,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移民。近万人的军队转业干部的安排,至少带来四五万人的移民。其中有外省籍贯的军队转业干部,也有宁夏本籍贯的军队转业干部也大都来自农村入伍的,转业至宁夏城镇工作,也具有移民的性质。

农转非

“农转非”特指从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即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两种户籍制度。要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982年5月26日,自治区政府为贯彻落实1980年9月公安部、粮食部、国家人事部《关于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的规定》精神,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对解决宁夏部分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直系亲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发出通知(宁政发[1982]75号),决定采取分期分批逐步解决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在农村的直系亲属迁往城镇,由国家供应粮食问题(简称“农转非”),所需指数不占用公安部门正常审批的控制比例,由公安、粮食、人事部门逐年下达专项指标。

实行“农转非”政策后,大批的专业

技术干部的家属从农村迁移到宁夏的城镇。据统计,从1981年至1985年有3850名专业技术干部的家属从农村迁往城镇落户,人口人数达12300人。1984年自治区科技干部局成立后,继续落实此项工作,截至1999年,全区共解决5000多名专业技术干部和其他知识分子家属“农转非”,有2万多人迁往城镇落户。

解决部分专业技术干部家属“农转非”问题,这是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解决专业技术干部的实际困难起到很好的作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照顾。后来随着粮食及副食品供应的放

开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此项工作自然而然地终止了。“农转非”的政策也涉及到了部分干部和工人。如20世纪80年代,宁夏为煤矿职工解决了家属约5万人的“农转非”问题。

除了上述介绍的支宁人员的情况外,在支宁的移民大军中,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即许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下放”到宁夏,他们往往是科技人才和文教骨干力量,他们为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有在大灾之年,因灾逃荒到宁夏的灾民也有部分留在了宁夏,成为宁夏外来移民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接受军队转业干部人数统计表

年份	军队转业干部	年份	军队转业干部
1949-1957年	932名	1989年	93名
1958-1965年	1913名	1990年	63名
1975-1979年	1439名	1991年	82名
1980年	924名	1992年	75名
1981年	587名	1993年	202名
1982年	136名	1994年	156名
1983年	239名	1995年	113名
1984年	161名	1996年	154名
1985年	372名	1997年	167名
1986年	664名	1998年	212名
1987年	361名	1999年	340名
1988年	307名		

宁夏富硒枸杞第一人(一)

——记浙江支宁青年南梁农场场长徐阿奎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按照中央部署,1959年,浙江省委决定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中共浙江省委还发布了《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在指示中说:为了解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之能逐步地同内地一样获得迅速发展,齐头并进,将从1959年到1963年的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30万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争取动员5万人。指示中明确:动员支宁的对象应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健、家庭拖累不大的青年和一部分有较多生产经验的壮年,应配备一套包括各各行各业人员的班子,除了大部分是农民外,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包括手工业工作)及商业、教育、卫生和各種服务性行业人员,同时还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干部和党团员,以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浙江省委还专门成立浙江省动员青年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先期组织100多人的参观团来

宁夏参观访问,并协商有关送出和接收事宜。1959年浙江支宁青年共5万人分两批来宁,第一批2万人,第二批3万人,于3月至6月份到达宁夏。为了做好浙江支援宁夏的青年安置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员委员会”,由副主席马玉槐任主任,副主席王金璋、民政厅厅长刘震襄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民政厅副厅长马杰任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下设接待安置、交通运输、检查三个小组,负责办理具体工作。马玉槐要求各市、县积极做好欢迎及安置工作。并提出:按我区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及浙江民情,在统一调配、就地使用劳动力的原则下,将这批人员安置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川区,以参加农业生产为主,基本上按照地多人少的地区多分配,地少人多的地区少分配,大分散,小集中。同时要求各市、县迅速成立安置机构,由书记或县长牵头,设立办公室,将任务分配到人民公社,购置安置点公共食堂的灶具、席子、盛水缸和煤炭,做好短途运输的准备和

对浙江来宁人员的欢迎工作等。

今年81岁的徐阿奎出生在浙江富饶的鱼米之乡萧山,10岁前,家境贫寒的他始终处在半饥半饱中。新中国成立后,家里分到了土地和部分农具,全家人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可以用感激不尽来形容。土改后的徐阿奎跟着扫盲班读了点书,但也只是达到基本识字水平。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句老话,徐阿奎从小就对干农活比较内行,1956年,浙江省萧山县成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干活踏实,能吃苦耐劳,1958年底,徐阿奎光荣的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队长,在当时也算不小的官。

1959年春节刚过,公社召开会议,会上宣读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运动的号召》,希望有志青年主动报名,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个年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所有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已经是公社生产大队队长的徐阿奎没有任何犹豫,第一个报

了名。并扎根宁夏,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9年与徐阿奎同时期到达宁夏的浙江青年共5万余人,其中党员3000多人。所有的浙江支宁青年全部安置到10个国营农场。到1960年底,各国营农场接收安置江浙支宁人员96793人,他们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为增强民族团结,传授文化、技术,为宁夏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

徐阿奎:来宁夏是1959年5月初。当时浙江省政府发出动员令,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报名参加支援边疆建设。我作为一名党员,党的号召就是我们的行动命令,我们当时都十分激动,尽管对宁夏一无所知,但报名还是踊跃得很。

浙江的领导在动员时说:宁夏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草原,是鱼米之乡,人少地多,劳动力不足,有很大的施展空间。一听到有这样大物博的地方可以让青年人去施展,那还不抢着报名呀,生怕报晚了没有机会了,也没有跟家里的大人商量,就自己做主报了名。

(未完待续)
(黄银生 马君武 整理)

总工程师的人生经历(三)

——记长城机床铸造厂蔡文礼老人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日本马扎克公司在全世界都是独资的,没有合资。这个公司在宁夏提出要和长城机械铸造厂合资,政府也说了你们就干,人家不是看上你们了吗。蔡文礼他们干小巨人公司就这么干出来了,在设计规模年产400台机床,那时候蔡老他们这帮人较着劲玩命地干,大冬天还在施工盖小巨人厂房。他们采用洋法的、土法的手段,但是在2000年5月投产了。400台铸件做出来了,效益也挺好的。2004年,他们公司改制了,由国的改成全体职工持股。这时候日本一种惯用的理念提出来了,“什么全民持股,我搞不懂,我把我的所有股份都给你们了,我不干了。”日本人不干了,当时蔡老还是小巨人的董事,那不干了吗?向政府报告,当时产品升级以后,技术不会再给蔡老他们了,他们面临这个问题,自治区政府拟决定,由长城机械铸造厂帮着政府参谋,由政府出面必须扩大生产,不是日本人卖给长城机械铸造厂,是长城机械铸造厂卖给了日本人。“没办法,因为技术、产品设计都在日本,重要配件也在日本。谈了两年,政府也同意了,我们厂卖给了日本人,现在小巨人是日本独资的。我们那个股份没有了,但也没赔,卖了8000万,我

们也挣了点钱。”蔡老说。

奥地利方面,通过给欧洲做铸件,在欧洲还有点小名气,奥地利方面提出要和长城机床铸造厂合资搞铸钢件,之前他们是搞铸铁件。小巨人股份卖了,拿着8000万实现了与奥地利的合资,长城机床铸造厂占51%,奥地利占49%,实际就是对半。长城机床铸造厂产品做得非常好,就是现在的共享铸钢。

2006年,蔡老他们这个班子正式退出了,接力棒交给了以彭凡为首的领导班子。“这帮年轻人是通过我们培养起来的。他们很有创新精神,把这个企业管理得很好,市场开发得也很好。这期间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通过彭凡这个班子,他们把单一的铸钢件技术延伸到风电、火电、核电领域,他们的品种随之得到开发,而且是很火的势头。”蔡老说,“他们年轻人比我们强,按照现在的水平,我们之前做到世界有名才开发了市场,他们做到世界有名,让中国出名。创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科技部创新二等奖,在铸件产品拿这么高的奖是唯一的。”

蔡老说:要综合起来说三线企业,不说三线建设是失败还是成功,但当时国家的处境较为特殊。当时为什么下决心搞三线建设,有其特殊的背景。当

时三线建设大中型企业有2000多家,现在总的情况,48%发展的很好,共享集团大概在这个48%之内,有45%的产品和市场还可以,但是发展的速度不是很快,但也不算成功,有7%垮掉了。那么,就我们宁夏来讲,三线企业还剩多少?不多了。机械类产业共享集团是一个,再就是青铜峡铝业,煤机一、二、三厂,吴忠仪表厂等,剩下的都垮了。我们机械行业,原来有个重工业厅,轻工业一毛、二毛、三毛纺织厂全垮掉了。当时建二毛、三毛的时候,长城机床铸造厂的人很羡慕,因为两家厂离得很近,人家有宿舍,而且盖的房子很多,但没有起来全垮了。长城机床铸造厂,不能说全垮,它卖了,卖了还继续生产,这是国家政策上允许的。原来大河机床厂,蔡老跟他们开玩笑说:不叫宁夏日报,叫大河日报算了,天天都是大河机床厂的消息。之后不行了,如果卖了能干下去也行,但是卖了还彻底垮了。因为这个事,宁夏机械协会也跟他们讨论过,要发展就要找出路。

三线企业,都是一帮年轻人,除了几位领导超过40岁,再都不超过40岁,就像蔡老他们才20多岁。“我们这个三线企业能够随着时间的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推行,创新科研管理,这是三线建设发展的一个出路。如果我们不

走这个路,我们最先垮掉。”蔡老从个人体会深情地说,“整个三线建设,就像那个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故事一样,经过艰苦奋斗,最后取得一点点成就感,应该说是我们这代人的欣慰吧!”长城机床厂、大河机床厂同行们讨论说:“老蔡,你们这批人值得我们赞赏的,你们的企业发展了,我们比较悲伤,我们企业给黄了。”宁夏40周年大庆的时候,宁夏电视台采访,蔡老不愿意接受他们的采访,最后堵在办公室,还是接受了采访。以“无怨无悔人生路”为题播放。电视台的人说:“采访的内容播了,你看到吗?”蔡老说:“看到了。我说的好听的你们全播,我说不好听的全部去掉了。”蔡老认为从整体来讲,宁夏三线企业无论今天发展的如何,他确实带动了宁夏企业的发展布局。50年前,他们来宁夏的时候有啥?只有机械修备厂,再啥都没有。所以,三线建设带动了宁夏经济发展,虽然后来垮了,但是它带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这些国营企业里一部分人后来都出去办了民营企业,这同样推动了宁夏经济的发展。所以,三线企业对宁夏经济的发展、对国家整个工业的布局产生过很大影响。(未完待续)
(薛正昌 杜恩东 整理)

往事回顾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片断回忆

卫一吾同志的回忆

1941年六七月间,西、海、固回民第三次反抗国民党压迫的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群众在马思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当时,我正在庆阳专区统战部工作。因为我曾在西吉单家集住过,对回民的风俗习惯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派我到回民骑兵团工作。当时,回民骑兵团住在合水县蒿槽铺。我负责办理供给和登记人员、枪支、马匹等。记得骑兵团共有220多人,编为3个连。团长马思义的枪法很好,一挥枪就能打下屋檐上的花瓦边。那时生活条件很差,我给战士们发夏衣时,衣服上没纽扣,只好发给每人一块灰布,让自己找几个铜钱包了做纽扣,后来又用桃核做。我在回民骑兵团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延安派来杨仁(杨静仁)和鲜维俊(都是回族)到骑兵团接替我的工作。我又回到陇东地委统战部。以后,党又派马克和何仲发到回民骑兵团。

到了冬初,回民骑兵团的战士,要求回西海固看望家属。当时,正是全国抗日艰难时期,也是国民党一再借端发起反共高潮时期,组织上考虑到回民骑兵团一出边区,就会给国民党造成借口,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扰乱抗日后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劝说回民骑兵团不出边区,组织上派我和段德章又到骑兵团工作(这时我已调到延安经济工作组工作),骑兵团驻庆阳三十里铺。当时,我还给回民骑兵团的干部和战士讲过话,指出离开边区对自己不利,但他们还是执意要走。最后,我便向马思义提出,一出边区,就要打仗死人,如果一定要回去看看,要把老汉、娃娃留下。马思义同意后,我们便将老小转移到曲子,成立了留守处。马思义因病未走,让他负责留守处工作。我到回民骑兵团的第三天,杨仁(杨静仁)从延安带来了路费,将马思义一行送出了边区。

1941年初冬,马思义率部分起义军自边区回固原,依山行军,没有人川,故与国民党军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当时,杨德亮(国民党四十二军军长)的兄弟杨德祥(连长)驻西吉沙沟大寨,他仍用诱骗马国琳的办法,利用当时宗教上层人士中的一个老者,派人向马思义劝降说:如马思义率队投降,可不咎既往,还可带兵做官。马思义的回答很明朗:“受骗吃亏,只有再一再二,决没有再三再四,叫杨德亮弟兄趁早收起他的用回杀人的老办法。”可是马思义队伍中一部分思家恋子、思想动摇的人听信劝降,投降了国民党,欲想安居乐业。哪知国民党政府,以后把这些人关进监狱判了刑。

马辰同志的回忆

1941年初冬,马思义率部分起义军自边区回固原,依山行军,没有人川,故与国民党军队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当时,杨德亮(国民党四十二军军长)的兄弟杨德祥(连长)驻西吉沙沟大寨,他仍用诱骗马国琳的办法,利用当时宗教上层人士中的一个老者,派人向马思义劝降说:如马思义率队投降,可不咎既往,还可带兵做官。马思义的回答很明朗:“受骗吃亏,只有再一再二,决没有再三再四,叫杨德亮弟兄趁早收起他的用回杀人的老办法。”可是马思义队伍中一部分思家恋子、思想动摇的人听信劝降,投降了国民党,欲想安居乐业。哪知国民党政府,以后把这些人关进监狱判了刑。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二辑)

回汉团结建设西北

——访马鸿宾委员

张鸣

出生于甘肃临夏,年高68岁的马鸿宾委员,在西北回民中享有声望。由于他的高瞻远瞩,在宁夏解放中,曾率部光荣起义。

1949年8月兰州战役,人民解放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强大的人民军队以锐不可挡之势,向宁夏挺进,马鸿宾畏罪逃逸,守军丧失斗志。那时闲居银川的马晋老纵观大势,分析内情,毅然主张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和平条件。他说:“民国三十七年中国没有实现民主,但必有一天要真正实现。解放军胜利成功,就是民主到来的表现。”九月间,原国民党八十一军于西北人民获得空前伟大胜利形势下(以前为马鸿宾委员统率,现军长为其子马惇靖)在中卫起义。原属马鸿宾之其他三个军亦无力进行任何抵抗,银川驻军顿成溃散状态。马鸿宾于22日派出和平代表团到中宁商谈,23日又派汽车到黄河岸边迎接解放军,至此银川市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在军管期内,他担任军管会副主任,协力维持秩序进行接管,号召流散军官投诚登记交出武器,收效很大。鉴于中共土地政策的正确,当时他向军管会表示赞成实行土地改革,并提出先把自己的地交出来,足见趋向民主的至诚。

日前记者访问了马鸿宾,他穿着黑色棉长袍,头戴皮帽子,沉静寡言,怡然自适。几天后,他换了一身灰色棉制服,这使记者想起问他过去情况时的回答:“不说过去,那是落后的,要说前进步的话。”他对记者说:“我今天看到了新书籍,要向别人领教,

寻求新道路,多读新书。”刚到交际处时,他要来许多现代书刊,那是表示要赶上向前去的意思。当问到西北民族问题如何解决时,马鸿宾沉静地答覆记者说:“过去造成民族间不团结全是上边领导不好,遇事处理不当的缘故。只要领导完善,民族本来是应该团结的。”

问:“怎样来达到各民族的团结?”

答:“各民族有共同纲领作为团结的路线,从中央到地方,各民族都参加政府委员会,组织成民族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就团结了。”

问:“回民在西北数量不少,其作用和要求是什么?”

答:“回汉语言文字都相同,容易团结,回民虽有不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共同纲领上规定有信教自由,回汉之间没有矛盾,应团结建设西北。”

谈到马鸿宾统治宁夏情形时,他摇摇头,两手作推门状,好象要把过去一切推开不愿再去回顾了。宁夏河渠纵横,一片沃野,应该是很富有的。马鸿宾问我对宁夏的观感,我告以那块富庶地方的见闻,金积、灵武一带,那时正是稻田初黄,阡陌飘香的时候,的确给人以美丽的印象。但还有大片农田荒芜着。他说:“宁夏过去不按规定办事,造成这个样子,用不着谈它了。”我们知道马鸿宾多年来受马鸿逵的排斥,在回民中虽享有威望,但却不能发挥个人的力量,现出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相信他会不负众望的。

(摘自《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四辑)原文刊于《群众日报》1950年1月24日第二版)